

# 青春的足迹

革命回忆录

沈一民著



# 目 录

- 1、姚北抗日第一仗 ..... ( 1 )
- 2、鏖战阳觉殿 ..... ( 7 )
- 3、怀念扬思一 ..... (12)
- 4、可亲的小杨 ..... (16)
- 5、我和赵树屏  
——纪念王益生同志牺牲五十周年 ..... (21)
- 6、筹建余姚中队的小张  
——怀念赵汝翰同志 ..... (26)
- 7、重逢 ..... (33)
- 8、同甘共苦的人 ..... (37)
- 9、北撤行程 ..... (42)
- 10、参加孟良崮战役点滴 ..... (46)
- 11、在消灭黄伯韬战斗中 ..... (51)
- 12、我去侦察营  
——怀念黄知真同志 ..... (58)

## 一、姚北抗日第一仗

1941年4月19日，日本鬼子在镇海湾塘登陆。国民党第三战区在浙东的十万军队闻讯而退。23日，余姚就沦陷。驻扎在庵东盐区的国民党中央税警队一个多团和余姚的自卫大队，也逃之夭夭。从而，富饶的三北（镇海、慈溪、余姚北部）地区一时混乱不堪。余姚县城、周巷、庵东都驻扎了鬼子兵。这时，有一批抗日无能扰民有余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也从上海浦东开到庵东盐场抢掠钱财。于是，整个三北地区弄得天昏地黑，鸡飞狗叫，老百姓陷入了痛苦深渊。

庵东沦陷，盐行倒闭，盐民生活困苦难言。原中共盐区区委书记宣则友的堂叔、崇德乡战社团的副支团长宣岳近，为了生计，装了两船盐，到上海浦东四灶港售盐换米，解决盐民饥饿。适逢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四大队的大队副林有璋，正向商行雇船，准备乘船把部队南渡来到浙东。宣岳近的两船盐刚卸完，商行老板同他商量。宣岳近曾受过革命教育，见林有璋说话和气，又是抗日的部队，就满口答应了。另外他又雇了一只，共三只船，由大队副林有璋，政委（对外称教官）蔡群帆率领，把淞沪游击第五支队四大队一百三十多人的队伍于6月12日下午，在浦东四灶港乘船南渡，由于风向不顺，船在海

上兜了两天，于十四日下午抵东三乡盐区海涂。当时，林有璋写了条子，派宣岳近上岸，与先行来姚的崇德三大队姜文光部队取得联系。上岸后一打听，姜文光部队住在六灶塘角张大兴家。于是部队上岸后，一部住在东三四灶罗家；一部和姜文光一起住在张在兴家。

16日，三大队四大队兄弟部队转移到许家村的民德小学和宣家一带。民德小学里有位许深洋教师，他在大革命和抗战时，受过共产党的教育，比较进步。林有璋、蔡群帆和他谈得很投机。他的家里有一个长工胡金潭，家穷，曾卖过壮丁，在旧军队里当过兵，有点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

6月18日上午八、九点钟，日本鬼子的小分队从庵东出发，第一次来相公殿。队伍的前面，一个鬼子兵掬着一面太阳旗（老百姓称膏药旗），后面有个穿便衣的汉奸，一路上指指点点的。有个军官模样的鬼子，不时用望远镜张望着。士兵的头上戴着铮亮的钢盔，脚穿齐膝的皮靴，手持步枪，作着战斗的准备姿态。有些得意忘形。他们走在六塘上，过向天庵经许家村。刚进相公殿前，先打了两个掷弹筒，虚张声势地壮壮胆。周围的老百姓听到鬼子的炮声，知道敌人到了相公殿，惊慌地向四周逃躲。我们部队事已得到情报，早已埋伏好了。

许家村离相公殿仅二里路。部队埋伏在六塘后不远的黄家、胡家、姚家一带。黄家、胡家的屋上架了两挺机枪。在姚家的屋上，埋伏了一个班的步枪班。周围的土墩、泥蓬、沟渠

等处,用了伪装,也布置了兵力。原打算在鬼子兵去相公殿的路上袭击。林有璋考虑到鬼子兵去时思想上有所警惕,倒不如等鬼子兵返回时戒备松懈时动手为好。为了更稳妥些,不打无把握之仗,就派胡金潭去相公殿把敌人的兵力、武器、弹药更好的侦察清楚。因为胡金潭对相公殿很熟悉,他和伪乡长陈庭辉也很熟。因此,直奔乡公所。陈庭辉原是我党的同情分子,他了解来意后,给了胡金潭一块红袖章,戴上这标志,算是伪乡公所的人了,鬼子兵不会查问。胡金潭到街上走了一圈,见鬼子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吃饭的,胡金潭把这一切记在心里。这个小分队连一个汉奸在内,共有三十七人,有两个掷弹筒,一挺轻机枪,三十条三八枪,三支短枪。胡金潭很快到乡公所,又问陈庭辉:“鬼子下午到哪里去?”“鬼子要我们筹慰劳品,正在等老酒、香烟、鸡和钞票,三点钟左右重返庵东!”陈庭辉这样说。胡金潭飞快赶回部队,已是十二点钟了。向林有璋、蔡群帆作了汇报,情况更清楚了。本来在六塘南高粱地里,也布置了三大队兵力,后来听一个坎墩卖杨梅的农民说,坎墩也有鬼子兵,于是把六塘南的兵撤除了。

下午三时左右,鬼子兵果然向庵东出发了。他们分为二路纵队,走在前面的尖兵和带路的汉奸共七个人,中间是鬼子兵的队伍,后面是挑着八担老酒、三担鸡和香烟的老百姓。他们大模大样的走来,同志们看得清清楚楚。

鬼子兵越来越近了,当刚进入射击圈时,林有璋举起木壳枪“啪”的一声,顿时,埋伏着部队一齐开火“噼噼啪啪”的响成

一片。架在胡家、黄家屋上的两挺机枪，一下子打死鬼子兵十多人，但是狡猾的鬼子迅速卧伏在塘南坡进行还击，被我集密的火力压倒了。鬼子兵不得不弃尸丢盔，扶伤抛物地向庵东方向逃窜。战斗仅打了十几分钟，当场打死鬼子兵二人，为了火葬各斩去手臂一只，重伤七人。内三人途中死去，轻伤七人。后来，重伤的又死了三人。损兵折将将近一半，要不是把六塘南的兵力撤除，这次鬼子兵必定全军覆没。

这是姚北抗日第一枪，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它预告敌人必将最后灭亡，群情振奋，士气高涨，它震撼着浙东大地，点燃起熊熊的浙东抗日烈火。<sup>①</sup>

在6月30日，日本鬼子为报复，调集伪军300余人，鬼子兵100余人，带着山炮两门，在天还未亮的时候来相公殿反复。实际那天五支队的队伍，也在天未亮的时候先于日伪军队伍从西面开过来到六灶塘角张大兴家去。日伪军队伍在五支队后面相距稍远些去相公殿扫荡报复。因天未亮，又有雾气，彼此也看不到。待五支队已到张大兴家，日伪军小心翼翼还只到上次战斗过的地方。他们到张大兴家，日伪军小心翼翼还只到上次战斗过的地方。他们认为游击队仍在老地方。神经过敏地全体陆续卧倒，作着战斗准备。这时胡金潭正在向天庵附近西瓜地里浇大粪，一见日伪军就飞也似地到张大兴家向林有璋汇报了这个情况。林有璋马上派出一个班

---

<sup>①</sup> 注：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时，在该战斗地立了“三北敌后抗日第一战”纪念碑。

的兵力向日伪军方向警戒。那知这个班很快和鬼子兵打了起来，鬼子兵向我们开了炮。在五支队的右边，驻扎着大量的“忠义救国军”队伍，他们本来是挂着抗日的招牌，是抗日无能，扰民有余的部队。由于第一次五支队打鬼子，名气很大，它硬着头皮，也想出一下风头，总算也打了几枪。五支队表面和它是友军，了解地是银样蜡枪头，是不会打仗的，因此激烈地和日伪军战斗了一阵。这次打死打伤了几个日伪军，就迅速撤出战场，由胡金潭带路把部队带到东三乡的水霖浦。日伪军和五支队一接火就死了一些人，见到黑压压的到处都是游击队，恐怕和上次一样弃尸丢盔吃败仗，因此，就疯狂地打了一通。日伪军打死，伤老百姓十余人，日伪军恐慌万分地又逃回庵东去了。实际日伪军所见的“忠义救国家”队伍，是绣花枕头稻草包，一点也没有用的，虽则硬着头皮打了一下，鬼子兵认为都是我们五支队一样的抗日部队哩！日本鬼子和五支队两次战斗都吃了亏，就不敢再轻易来相公殿。可是“忠义救国军”就大吹牛皮，说他们如何凶狠地打日本鬼子。他们的部队，有陆大队、王大队，还有乱七八糟的番号。王大队属于李文元部队，李文元原是国民党韩德勤的一个旅长，在上海浦东被日本鬼子打得大败，到浙东来，改称为“忠义救国军”李司令。

日本鬼子不敢东来了。福寿乡、崇德乡，东三乡就成了“忠义救国军”的天下。他们设卡收盐税及各种货物税，作威作福，无恶不作。向老百姓敲竹杠，青年妇女被他们糟塌，盐

民吃了日本鬼子的苦头，现在又吃“忠义救国军”的苦头。在这兵匪不分的日子，老百姓遭着大难。现在我想谈一谈这次战斗中死伤的一些老百姓。死的共八人，一是严志荣，是严成海的父亲，时年四十岁，被日寇戳死，肚子被戮了七刀。二是徐张福，从盐仓里跑出来，正遇敌人，被敌人用刺刀戮死。三是施光福的妻子，敌人从相公殿打下来，头一个被敌人枪弹打死。四是杨万龙的儿子，还只有二、三岁，由母亲抱着，被敌人的子弹飞过来打死，地点在杨万利南面。五是杨仁才的儿子，亦只二、三岁，由母亲抱着逃跑时被敌人打死。六是姚张福，敌人用刺刀戳死时已六十余岁。七是姚张新，他在河里摸鱼，也被敌人打死。八是龚永思，打死时还只十一岁，后脑壳被子弹打进而死，伤的据说有五、六人，但我只了解两人，一个是陆金木的大儿子，当时嘴角被子弹打过，脸部的肉被削去，现住崇寿乡东升大队；一个是杨仁华的妻子，当时四十余岁，手腕被打穿，是俞开尧的姐姐。

1982年10月稿



## 二、鏖战阳觉殿

1942年夏，中共中央华中局先后派潭启龙、何克希同志来三北建立抗日根据地，成立三北游击司令部，加强了对浙东敌后抗日斗争的领导。

三北地区土肥水丰、交通发达，固是优点，但地形狭小，河流纵横，敌人便于进犯，周旋余地不大，所以建立根据地也有利有弊。这时，敌人闻得“三北游击司令部”的建立，一时惊慌失措，即调集日伪军数千兵力，对我们进行大扫荡，妄图扑灭我军。浙东区党委一方面给来犯之敌人以狠狠打击，另一方面，根据华中局指示，提出“坚持三北，开辟四明”的战略方针。因为四明山地形复杂，峰峦重叠，南迤天台，西通会稽，是鄞、慈、姚、奉、新、嵊、上等七县边界顽敌控制力量较弱，便于我们活动的地区。所以，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待出发。

当时，正值大扫荡。为顺利进军“开辟四明”，尽可能避免和日伪军的接触，部队先在五磊寺隐蔽三天。观城镇、鸣鹤场都驻有日伪军，晚上重要路口有敌人巡逻队。这样我们选在十月七日晚上八时，司令部、政治部、四支队等一行四、五百人的队伍，摸黑从鸣鹤场后面的田径小路出发，绕道山路，到上林湖的普济寺去宿营，以便在那里开个会，然后向四明山进

军。那知部队行进到上林湖的山路时，侦察员回来说，普济寺白天被日寇烧掉了，还驻扎着日伪军。我们只好停止前进，暂在路上休息，等司令部的命令。这样，在山间休息了一、二个钟点。十月的天气，战士们还穿着单军装，在午夜冷得哆嗦起来。最后总算等到命令，宿营地改为从未去过的阳觉殿，部队继续出发。

夜，漆黑的一片，没有星星和月亮。我们每个战士的背包上虽有一条白毛巾横拦着，作为联络的标志，但还是看不清楚，往往前后脱节。这时，我们四支三中却掉队迷了路。山路崎岖，林深树密，挂在树上的朱红柿碰得我们的头部怪痛；脚也早已起了泡，现在又迷了路，大家的心里很急。指导员肖张同志看出我们情绪，叫我们不要慌张，并说：“我们革命的军队离不开群众，快找个老乡来做响导。”

我到山脚下找来了一位老大爷，他知道我们是三五支队，关心地说：“好危险呀！离这里三里路就是二六市，三七市，那里是敌人的据点，你们再走下去就要摸到敌人那里去了。”老大爷主动给我们做响导折转方向，绕道行军。到达阳觉殿，已是下半夜二、三点钟了。

阳觉殿在三七市北，古称清隐庵，建筑精美，画栋雕梁，绿色的琉璃瓦，隐藏在深山密林间。古人有诗赞：“万壑松涛万竹烟，摩崖直欲挹青天。”这里住的都是善男信女，男的见我们哆哆嗦嗦，女的始终不肯露面。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兵匪难分，他（她）们当然是非常害怕的。我们因急行军，又掉队走

了许多冤枉路，已是精疲力竭，见到一、二中和特中已宿营，放了哨，司令部、政治部等直属机关又住在大殿里，以为好歇脚休息了。谁知刚推开被褥，来人告知，三中队的宿营地在后山最高处葛仙翁庙里，我们还得向上爬。漆黑的夜，脚高脚低真是难走，一不小心，就会跌进山涧。来到葛仙翁庙，还没睡下，山下的机枪“咯咯咯……”地叫了起来。领导马上要炊事员提早开饭。部队一面吃饭，一面进阵地，全部埋伏要炊事员提早开饭。部队一面吃饭，一面进入阵地，全部埋伏在山上的一条路边。山上松林呼啸，山下陡坡悬崖，一场鏖战将在这里打响。这已是10月8日了。

我们一、二中队、特务中队与敌人打得很激烈的步枪声、机枪声响个不停。日寇的小钢炮、掷弹筒，使整个山峪震动。一、二中队在正面杀得日寇无法冲上来。上面，正是我们三中队的阵地，只见鬼子依着山麓从竹林里隐蔽着冲上来，我们用手榴弹猛打猛冲。班、排长，老战士比较沉着，也打得准，又是居高临下，很快把敌人的第一次冲锋打了下去。

说起我们这个三中队，在七、八月份，是姚北成立的新兵中队，除部分班排干部是老战士外，其他都是响应余姚县委号召，从庵东盐区和肖林棉区，以及黎州等地刚入伍的地方党员和抗日分子。他们政治觉悟高，但没有战斗经验，中队的几个领导；指导员肖张同志（赵汝翰）是原中共余姚县委委员；中队长谭斌同志是浦东的老同志；我是副指导员，也是刚入伍的新兵，文化教员郁忠同志是浦东来的。这样一个中队，遇上战

斗，的确有些慌张，所以敌人开始冲上来时，有的打了枪，不会拉机柄跳出弹壳，有的扔手榴弹，却忘了拉导火线，但在第一次的交战中大家都得到了锻炼。

战斗在继续，肖张同志在战斗间隙找谭斌和我研究，重新作了战斗部署，并具体分了工，安排老兵、班长打枪，指定几个新兵送子弹，把手榴弹集中起来，由谭斌中队长带几个老手专扔手榴弹。还有些新兵，由我带领他们搬石块，一面作防御工事；另当鬼子冲上来时，石头当作武器使用。当鬼子第二次冲上来时，我们的火力相当集中，枪打得猛，手榴弹扔得准，当敌人冲到半山腰，我们把石块往下扔，越扔越快、越大，真是把敌人打得“哇哇”叫，屁滚尿流地退了下去。有两脚朝天时，有脑浆迸裂的，郁忠同志在旁喊着口号，鼓动战斗，大大鼓舞了士气。敌人躲在密竹松林里，依仗岩石护身，嗦嗦发抖，再不敢冲上来，他们泄气了。

同志们看到东一堆西一堆的敌人尸体，简直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哈哈，打日本鬼子也不难呀！”其实，这次战斗谭、何等两位首长是直接指挥，主要是靠一、二中和持中，我们这个新兵中队只能算配合。

敌人总是不死心，仗着人多又从三面包围上来，几个小山头被占领并登殿后高山，想切断我们的退路。经过二小时的激烈战斗，又打死打伤敌人三十多人。我们肩负着进军四明山的战略任务，司令部命令实行撤退。部队在特中重机枪的掩护下，从容地撤到游源、金鸡岙一带。

这一仗，扫除了进军四明山的第一个障碍，提高了战斗士气，接着，五支队又打胜了竹山岙战斗，被誉为“二战二捷”。

所怜惜的那些奉男信女在阳觉殿，战斗打响时，他们吓得魂不附体，只求苍天保佑，敌我的枪弹打得越激烈，他们的木鱼也敲得越响。我们撤走后，鬼子兽性大发，女的被奸污直至惨遭杀害，并纵火烧毁了阳觉殿。

十月九日傍晚，部队从驻地经戚家大山，翻十里长湾，在蜀山渡过姚江到黎洲乡的十五岙，进入四明山区，终于实现了进军四明山的战略任务。

---

注①上述两篇歼敌记，为纪念浙东区党委成立四十周年而作。1982年发表于余姚文化馆《四明之窗》第一期，并转载宁波地区文艺刊物。

注②此文原我提供资料，唐武声整理。发表《慈溪文艺》后有几处和当时情况不符。我改写后和“相公殿第一仗”一起发表余姚《四明之窗》，但很多还是唐武声同志文笔。

### 三、怀念杨思一

杨思一同志，浙江诸暨人，听说他是入党很早的一个老同志，被捕后坐过多年牢，国共第二次合作才放出来。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40年国内政治形势逆转的时候，那年7月，在四明山陈霸岭特委所办的党训班，我们曾同吃同睡二十余天。他作风朴素、生活清贫、工作细致。我们一些地下工作者都习惯地称他为老杨同志。余姚盐场，是党十分重视的地方。1939年秋天，他来到庵东北面二、三里的沈静耀家里，召开庵东支部党员座谈会，了解盐民生活和盐业生产的具体情况。当时余姚政工队，马青同志率第一区队，在庵东西潭海乡、大云乡、义四乡活动，听说他也多次到义四乡劳家棣。

1941年4月浙东宁绍地区沦陷，我党领导的五支四大从上海浦东开到三北地区，在相公殿打日本鬼子后，余姚党和他们发生了横的关系。是年9、10月杨思一同志来后，对五支四大这个部队有疑问？所以同与部队接触过的同志了解情况。道林的原余姚政工队的老同志柴华法（些一清）来我家，要我去樟树，说：“有人找我。”我就跟他到樟树岑维青家。在他家吃了晚饭，维青领我沿山脚到一家田中间的屋里，在那里见到杨思一同志，因我们在四明山党训班已相熟。感到很亲热，接

着就上床长谈。他首先问我盐区情况，我说：“盐区沦陷，国民党的运销处跑掉，盐无销路，靠对江来的客商收点盐，盐民生活又陷入绝境。”接着他问我：“对江开来的五支队，听说你经常去，你感到这个部队怎样？”我天真地说：“这个部队是我们自己的部队，他们来后，在相公殿狠打了日本鬼子，他们的战士，多数人有一支钢笔，写字学习，蔡教官每天给他们上课，讲的都是抗日的道理，唱着抗日的歌曲，对老百姓态度很好，出发时，还好东西，打扫清洁，不像国民党部队，对老百姓很凶”。他问我答讲了很多，直谈到深夜还没睡。最后他对我说：“这个部队，究竟是什么部队现在还未搞清楚，现在别的地方有这种情况，国民党部队扮作我们新四军面目出现来进行破坏。我听到这话似触电一样地吃惊，心想糟糕，搞三十四师牺牲了好几个同志，现在我们进去的人更多，要是这个部队靠不住，损失会更大，他说：“这样重大的事，不及时向特委报告，我已批评了张光。”我说：“张光是谁？”他说：“张光是县特派员，难道你们还未见过面？”原来张光同志初来余姚叫胡章生，我才知道胡章生就是张光同志。

正在这时，特委接到可靠方面消息，在三北活动的淞吴五支队，确是我们自己的部队，要特委主动和部队联系。可当时特委书记在姚北，所以特委委员马青同志直接来姚北找杨思一。马青在姚北找到杨思一，就把这消息告诉了杨思一同志，杨思一同志就叫马青同志去慈北直接和五支队联系。当时五支队和暂三纵的党有了军分委，有3人组成：吕炳奎、王仲良、

蔡群帆，书记是吕炳奎同志。因薛诚同志已在五支队，所以马青同所找到薛城就直接和吕炳同志联系。据说五支队知道地方党的困难，杨思一同志回诸暨时，部队还支援了不少经济。虽则这时还不是党的正式关系，但比之原发生的横的关系就不同了。这段消息是1971年马青同志来上海直接告诉我的。

1942年5月，日寇又向浙赣线进攻，诸暨、金华沦陷，军分委从五支、暂三纵抽调人员及余姚朱之光、周曼天率领的地方部队合并组成南进支队，又称达谊部队，由蔡群同志任支队长，挺进到诸暨枫桥。同时开辟了会暨山的金肖地区。1942年7、8月，谭启龙、何司令相继来三北浙东地方党和部队党正式接上关系，成立浙东党委和三北司令部。10月，司令部率四支队挺进四明山，正式开辟四明山根据地，杨思一同志参加浙东区党委被选为组织部长。在金暨山成立金肖地委和金肖支队时，杨思一为地委书记和金肖支队政治委员。他转战会稽山、四明山，对开辟浙东根据地作了重大贡献。

毛主席在重庆谈判，为了和平民主，让出江南八大解放区，浙东抗日根据地亦属八大解放区之一。我们浙东新四军包括地方干部共一万五、六千人，于十月初，东到观海卫北面，西到临山北大丁丘一百余里海沿线，乘帆船分多路北撤经上海青浦观音堂，渡长江到长江以北，在涟水和苏中部队编为新四军一纵队。杨思一同志任一纵队三旅政治部主任。我当时背部有伤调离战斗连队，到三旅卫生部任指导员；一面工作，一面休养。三旅都是浙东部队改编的。1946年1月10日停



战命令后就驻在山东泰安城郊，因工作关系经常和杨思一同志接触。不久我调纵部直属队。部队改称华东野战军一纵队后，杨思一同志任一纵三师政治委员。1948年上半年为反攻打到南方来成立了先遣纵队，杨思一同志在先遣队任支队政治委员。全国解放后，他在浙江先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后调任省组织部长、副省长。我于1954年从中央军委化学兵学校转业到浙江，他住西湖大华饭店，我当时在分配工作前尚在学习班，特去看他。他当时任副省长兼组织部长。我们多年不见，感到十分亲切。谈到工作问题，他说杭州有个疗养性的医院，尚缺领导，你如愿意可到那里去。学习班结束后我分配到杭州铁路分局，也不再去麻烦他了。后来几次去他家，他工作忙，连一次也碰不到。

1957年，我为支援公私合营企业调到上海工作，在报上看到浙江大右派杨思一反党反社会主义，开除党籍的消息，使我感到吃惊。他对党对革命这样忠心的人，怎么会变成右派呢？真是使人难以理解。所幸粉碎四人帮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受冤的人，都陆续得到平反昭雪，反右扩大化受冤的人，也得照雪。由此，杨思一同志也得到了平反。这说明我们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最终总能是非分明。愿杨思一同志永垂不朽。